

序 言

一九〇四年夏天梅雨初晴的一天，一只生下不久的小猫迷路走进夏目漱石的家。翌年一月发表的《我是猫》就是以这只小猫为模特的。漱石大概也没料到这竟成了他的处女作。

一九〇五年，漱石三十八岁。作为初出道的作家来说，可以说是大器晚成。在这之前，他只零碎写过俳句，也没有形成风格。漱石四十九岁病逝，生命不长，创作经历更短，前后不过十年。漱石又是一个很有特性、怪癖的人，创作一直处于紧张状态。

一般说，作家写一篇长篇小说之前，要有构思的过程，有的甚至还有篇小说提纲，不能什么准备也没有。说来奇特，《我是猫》成为长篇小说，却是另一种情况。

漱石是正冈子规“写生文”的崇拜者。子规死后，《杜鹃》杂志由高滨虚子主持。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在《杜鹃》同人组织的“山会”上，他朗读了《我是猫》，颇得好评。《杜鹃》杂志载于新年号，立即引起广泛反响。“在下是猫。还没名没姓。”以演说姿态开始的这句话，后来成为文坛的名句。“我”的原文为“吾辈”，后来成为小说的题名。“吾辈”、“余辈”、“我辈”在初次发表的正文中是混用的，强调用猫的眼睛观察人类和人类社会，带有嘲讽的意味。因为它生来不久就被书生扔掉，冻饿不堪，命运是不幸的。后为长着两撇胡须的教师苦沙弥收养，所见知识分子也都值得冷嘲热讽。《猫》本来只想发表一期即告结束，但它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夏目漱石。他进一步让猫观察下去，二月号《杜鹃》发表了续篇，四月号发表第三篇，一九〇六年八月号完成最后一章节第十一篇。小说在发表过程中就出版了单行本上编，完成时出版了中编和下编。小说的十一篇是在第一篇完成后逐渐构思的，没有严格的情节演进过程，既像抒情的“写生文”，又像结构松散的小说。作者后来说，它“没有题旨，没有结构，像无头无尾的海参似的。”

这是一篇在特殊条件下创作的特殊结构的小说。

极度郁愤是小说形成的条件，也是作家创作的动力。

一九〇三年由英国回到东京后的几年，是漱石一生中精神最紧张、最郁闷的一段时间。

回国后，作家和妻子镜子的关系更恶化了。漱石在夫妻关系上思想陈旧，要求妻子以他为绝对权威。而她的妻子精神却又不正常。结婚第二年镜子曾想投河自杀，漱石作俳句：“病妻室内灯昏暗/苦熬晚暮度秋天。”可以想见，一八八九年的秋季，镜子的精神病已经严重。漱石留英期间，曾给镜子写信，倾诉自己很孤独，责怪妻子不写信。不久他患了严重神经衰弱症，一时传说他疯了。文部省曾有“夏目漱石精神失常”、护送回国的电文。回国后，漱石常为神经衰弱而苦恼，常常做出越轨的行动。夫妻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。他无缘无故打几岁的小孩子，一件小事也大发脾气。一次四岁长女将一枚硬币放在火盆边，漱石头脑里显现出他在伦敦时一枚硬币引起的不快，动手打了女儿。妻子怀疑他有精神病，请医生做过诊断。漱石的急躁、愤怒和越轨，反映了他对镜子的期望破灭。

回国后，漱石在东京帝国大学任讲师，工作亦不顺利。“英国文学概说”前任教授小泉八云深受学生的欢迎，漱石接课后不为学生所容，后讲“文学论”，同样不受欢迎。他情绪低落，经常闷在讲师工作室里，绝少出门。碰上好天气，才在工作室近处的不忍池边度过。他一度想要辞职，所挣的工资也难以支撑沉重的家庭负担。

阴郁、愤懑、神经质等，必然对其处女作产生深刻的影响。漱石后来说：“我对这种神经衰弱和疯狂深表感谢之意。”可见，神经最紧张的日子也是作家走向创作繁荣的时刻。

这绝不意味着《猫》的创作失掉了理性。而是说，《猫》的创作实践确实和作家的精神系统的病狂联系在一起。特别值得注意的，就是作家用猫眼看人生与社会，其中充满离奇的想象。但它不是颠狂的疯人语，而在精神重压之下的愤懑的倾述，那境界远远高于世上哲理大家。

为了说明这一问题，我们不妨看看漱石的生活与思想经历。作家生于一八六七年，第二年便发生了明治维新，封建幕府垮台，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起来。父亲是江户（今东京）奉行所直辖的名主，世

道虽然变了,但仍拥有权势和财产。母亲是商家的女儿,作为后妻已生育四男一女。漱石初名金之助,不知为什么,父亲就是不喜欢,每晚放在另家夜店的篮子里,姐姐发现将他抱回家。九个月後送盐原昌之助为养子。盐原也是名主,明治维新废除这官位后,迁居到江户享乐商业区的浅草。九岁时因养父母离婚,漱石重归自家。十四岁他最恋慕的生母病死。少年学过汉学,后学英语。十七岁离家独立生活,考入大学预备门预科(今东京一高前身)。其间,生父与养父为漱石的户籍问题,争执不下,使他苦恼不堪。后来在小说《道草》中说:“不论从生父看,还是从养父看,他不是人,而是物品。”最终,生父付出赔偿,方告结束。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期间,与同级的正冈子规相识。一八九〇年进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英文科,并获文部省贷费生资格。一八九三年毕业后入大学院,却对英国文学产生怀疑,对禅宗发生浓厚兴趣。一八九六年与贵族院书记长女镜子结婚,其间曾先后任四国松山市松山中学、熊本第五高等学校教员。一九〇〇年留学英国。

漱石所经历的是明治维新后很多知识分子共同走过的路,但他有自己的曲折的生活历程,这就使他认识了很多知识分子没有认识到的事物。

一九一一年,夏目漱石在和歌山市发表以《现代日本的开化》为题的演说。认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“开化”,和欧洲是不同的。欧洲的开化是“内发的”,它经由几百年的积累,“如行云流水是自然发展的”。日本开化却是“外发的”,是“在与外国接触”过程中被迫转化的。文化也是在大受刺激下急剧转变的。因为外来文化消融存在问题,土壤和根底均不相同,从而“失去自己本位的能力”,就必然引起“国民的某种空虚感”,也会出现“不满与不安”,发生“神经衰弱”病症。为了不患“神经衰弱”,“只能向内发的方向发展”,这是“苦恼的真实”。

从上述演说不难看出,漱石对明治维新改革的不彻底性是有清醒的认识的。他在一九〇六年写作的《片断》中也说:“当知道开化的无价值,就是厌世观的开始。”进一步发展,就会成为“真正的厌世文学”。

这里特别引人注意的,是“厌世”的观点。“厌世”、“苦恼”、“郁

愤”是漱石常用的词汇，也是他的世界观和创作观。如他说：“不描写烦恼称不上是文学”，还说：“在现在不得神经衰弱的人，大多数是有钱的鲁钝之徒和没有教养的无良心之徒”。一九〇六年他在致高滨虚子的信里说，他创作《猫》等，即是在“倾诉”自己的郁闷和忿懣。

漱石在留学英国时写作的《片断》里还说：“有钱的人多数干的是无学无知的鄙劣之事”，“其结果是使没有教养、不足年龄、没有德义的人进入士大夫社会。”作家对资产阶级是厌恶的。在一九〇五年前后，即写作《我是猫》的那个时刻，作家在《片断》中写道：“汝所见者为利害之世。我所立者为理否之世。汝所见者为现象之世。我所视者为实相之世。人爵——天爵。荣枯——正邪。得失——善恶。”

一九〇二年当日本人为日英同盟缔结，日本跻身列强而欢呼时，漱石却以冷淡的面孔对待。他在致中根重一信中说：“今天欧洲文明失败的原因，就是极为悬殊的贫富差别。”这导致“革命的必然性”，“卡尔·马克思的所论”是“理所当然的事”。

漱石清楚地看出资本主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，而日本的矛盾则尤使他生厌和悲观。《我是猫》所针对的正是明治维新后的“金权社会”的矛盾及维新的不彻底性，即“利害”、“正邪”、“善恶”、“不安”、“空虚”等。作家是明治精神文明的最深刻的揭发者与批判者，他使用的手法是“猫”的嘲讽和评断。其辛辣和深刻性，迅即引起世人的感叹和兴味。

漱石和绝大多数资产阶级作家一样，看不到摆脱这一矛盾的出路，无法指明克服维新不彻底性的办法。他只能是郁闷与愤懣而已。他也力图寻找摆脱矛盾的方法，那就是推进“内发的”变化。不过，漱石所说的日本的“内发”，与欧洲也不同。他认为欧洲的文明也是失败的，日本自然不应该再走这条路。日本的另一条路，就是他后来提出的“则天去私”。这是一种东方的宗教观与社会观。在《猫》中，铃木藤十郎的“狂”、甘木医生的“死”和八木独仙的“信”都演绎着“则天去私”的观点。漱石虽然也嘲讽独仙的东方的“自然法”的修养，而最终他也只能在精神信仰上寻求解脱。

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，都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。漱石信

仰的也是个人主义。“则天去私”的宗教解脱是和个人主义相结合的。一九一四年，漱石在学习院辅仁会发表题为《我的个人主义》的讲演时说，“权力的威压”、“金钱的诱惑”会导致危险的后果，与人的个性也是矛盾的。一个人首先要“发展个性”、“尊重个性”，“我毫无忌惮地公开说，我是个人主义”。作家认为个人主义以“自己本位”立足，和“国家主义”不是背反的，只是国家间的道义不如个人道义。他主张“以个人幸福为基础的个人主义，其内容当然是个人的自由。但是，各个人享有的自由是顺从国家安危的，就像寒暑表的升降一样。”在这里不难看出漱石资产阶级国家观的局限性。

上述对夏目漱石在二十世纪初年精神危机状态的了解和对其社会观、世界观的认识，是打开《我是猫》的门户的钥匙。有了这把钥匙，漱石的全部作品都可以打开。

《猫》的译者于雷，是我熟悉的作家、诗人、编审，也是日本文学翻译家。我们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共同度过了那些值得怀念的战斗时日。现在他要我为《猫》写序，我高兴地答应了他。是为序。

吕元明

译者前言

首先，就书名的译法交代几句。

一九八五年我一动手翻译这部作品，就为小说开头第一句、也便是书名的译法陷于深深的困惑。历来，这本书都是被译为《我是猫》的，然而，我不大赞同。因为，一、原书名不单纯是一个普通的判断句，就是说，它的题旨不在于求证“我是猫”，而是面对它眼里的愚蠢人类夸耀：“咱是猫，不是人”；二、尽管自诩为上知天文、下谙地理的圣猫、灵猫、神猫，本应大名鼎鼎，却还没有个名字，这矛盾的讽刺、幽默的声色，扩散为全书的风格。

问题在于原文的“吾輩”这个词怎么译才好。它是以“我”为核心，但又不同于日文的“私”(わたくし)。原来“吾輩”这个词，源于日本古代老臣在新帝面前的谦称。不亢不卑，却谦中有傲，类似我国古代宦官口里的“咱家”。明治前后，“吾輩”这个词流于市井，类似我国评书中的“在下”，孙悟空口里的“俺老孙”，还有自鸣得意的“咱”，以及“老敞”等等。“敞”，本是谦称，加个“老”字，就不是等闲之辈了。

我曾写信请教过一些日本朋友与国内作家、翻译家、编辑，有的同意用“在下”，有的同意用“咱家”，还有的劝我不要费脑筋耍什么花样，就译成“我是猫”蛮好。于是，我的译文改来改去，忽而“在下”，忽而“咱家”，忽而“小可”，总是举棋未定。直到刘德友先生和冷铁铮先生发表了学术性很强的论文，才胆子壮了，确定用“咱家”。当然，这是根据猫公心态和文章风格而定，并不是说“吾輩”只能译成“咱家”。近读日本一位已故公使留下的一篇与中国要人接触的回忆录中，也曾以谦虚的口气用过“吾輩”一词，我想，这就不宜译成“咱家”，倒近乎“不才”、“小可”……

至于书名，因为至今日本文学史、甚至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

都译为《我是猫》，已经深入人心，不便再改，所以，仍依旧译。不过，书名是“我是猫”，文中却译为“咱家是猫”，总有点别扭。但只好权且如此，敬候批评。

《我是猫》，够得上日本的才子书之一，也是世界文学名著之一。

夏目漱石，一生才华横溢，只搞十年创作，却留下了一系列珍品。他的全部作品，大体反映了明治时期知识分子的一颗痛苦而不安的灵魂，反映了他在东方思维和西方文明、在虚幻理想与残酷现实、在迂腐守旧与拜金大潮之间的艰辛求探与惨痛折磨。

作者早期曾提倡写生文，将自然与人生当成一幅写生画来描绘。要求超脱莽莽红尘的污风俗雨，写“无我之境”的真实与美，反对自然主义在阴暗的现实中爬行。因此，他的前期作品固然以现实主义为基调，但浪漫气氛浓烈，绚丽、激情；长于雄辩，妙趣横生。到了中期，尽管曾提倡写超俗空灵的写生文，但写来写去，仍是摆脱不掉人世浓愁，心灵的悲苦凝于笔端，因此，文风趋实，有了新的深度。晚期，对物欲横流、私心膨胀的现实社会厌恶已极，幻想“则天去私”成为人心准则。但那个乌托邦，连他自己也想象不出将是个什么样子。他晚期作品的文字风格，苍凉、凝重，状物喻事精微得出神入化。

每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，总体看来，无不是那一民族或国家的气质、性格、智慧与感情的写照，如同烟波浩渺的一川大江，是民族的历史在思考……

《我是猫》，不知可否说是大和民族在明治时期精神反馈的“冥思录”之一。

《猫》所处的时代恰是明治维新以后。一方面，资本主义思潮兴起，人们学习西方，寻找个性，呼唤自由，自我意识和市场观念形成大潮；另一方面，东方固有的价值观、文化观与风尚习俗，包含着陈腐与优异，在抗议中沉没，在沉没中挣扎……

一群穷酸潦倒的知识分子面临新思潮，既顺应，又嘲笑；既贬斥，又无奈，惶惶焉不知所措，只靠插科打诨、玩世不恭来消磨难捱

的时光。他们时刻在嘲笑和捉弄别人，却又时刻遭受命运与时代的捉弄与嘲笑。

主人公是猫。以猫的眼睛看世界，这在当时，在创作手法上有一定的突破。今天常有作品以外星人的视觉看地球人，同样反映了人间积习，没一副超越现实的视角就看不透彻。

猫公很富于哲理，精于辞辩，对人类的弱点讽喻得十分透骨。例如：“世人褒贬，因时因地而不同，像我的眼珠一样变化多端。我的眼珠不过忽大忽小，而人间的评说却在颠倒黑白，颠倒黑白也无妨，因为事物本来就有两面和两头。只要抓住两头，对同一事物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这是人类通权达变的拿手好戏。”他抨击社会，也见地非凡：“……说不定整个社会便是疯人的群体。疯人们聚在一起，互相残杀，互相争吵，互相叫骂，互相角逐。莫非所谓社会，便是全体疯子的集合体，像细胞之于生物一样沉沉浮浮、浮浮沉沉地过活下去？说不定其中有些人略辨是非，通情达理，反而成为障碍，才创造了疯人院，把那些人送了进去，不叫他们再见天日。如此说来，被幽禁在疯人院里的才是正常人，而留在疯人院墙外的倒是些疯子了。说不定当疯人孤立时，到处都把他們看成疯子；但是，当他们成为一个群体，有了力量之后，便成为健全的人了。大疯子滥用金钱与权势，役使众多的小疯子，逞其淫威，还要被夸为杰出的人物，这种事是不鲜其例的，真是把人搞糊涂了。”

猫公博学多识，通晓天地古今，他引证或褒贬了荷马、毕达哥拉斯、笛卡儿、克莱尔、尼采、贝多芬、巴尔扎克、莎士比亚、孔子、老子、宋玉、韩愈、鲍照、晏殊、陶渊明，以及《诗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等等数不清的中外名人名言。他还很有点自由平等观念。他说：“既不能零售空气，又不能割据苍天，那么，土地私有，岂不也是不合理吗？”猫公针贬时弊，道出了一串串永远耐人寻味的警句名言，诸如：“咱家不清楚使地球旋转的究竟是什么力量，但是知道使社会动转的确实是金钱……连太阳能够平安地从东方升起，又平安地落在西方，也完全托了实业家的福。”“官吏本是人民的公仆、代理人，为了办事方便，人民才给了他们一定的权力。但是，他们却摇身一变，认为那权力是自身固有而不容人民置喙。”猫

公批评大和魂说：“因为是魂，才常常恍恍惚惚。东乡大将有和大和魂，鱼贩子阿银有大和魂，骗子、拐子、杀人犯也都有大和魂。‘大和魂！’日本人喊罢，像肺病患者似的咳嗽起来，百米之外，吭的一声。”猫公还敢于蔑视权贵，鼓励创新。他描画乌鸦在东乡元师的铜像上便溺，把伊藤博文的照片倒贴在墙上。他说：“不从胯下倒看莎士比亚，文学就会灭亡……”

猫公喜怒笑骂，皆成文章。悲痛幻化的笑声，最令人难耐。

猫公如此神通广大，才高识卓，又公正锐敏，当然是神猫、奇猫、圣猫了。以它的眼睛看世界，悲痛化为笑声，怎能不尖酸苛薄！当然，它同时又是个俗猫，蠢猫。他自作聪明，假冒圣贤君子，误了不少事，吃了不少苦头，甚至不知酒桶会淹死猫，终于丢了性命。

小说尽管以“猫眼看世界”，但写来写去，创作主体还是人类中的一个“我”，或是人类的邻居、地球上的另一个他（猫）。假如以全宇宙中的“我”或永恒中的“他”来观察人类，更不知将写出什么样的奇书了。

小说在结构上也有突破。它以猫的视觉为座轴，可长可短，忽东忽西，并没有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，也谈不上情节进展的逻辑，读来却也津津有味。日本小说曾有散文化的趋势，某些小说的散文文化，是有欠充实的反映。而在《猫》，在当时，却是一种具有魅力的创新。当然，老实说，作者最初并没有想写这么长。由于首章轰动，编者要他续写，他才铺陈连载，这说明他并没有通篇的完整构思，同时也说明如不是大家手笔，怎么会写得这么左右逢源，随心所欲。

在语言上，《猫》的格调既不全像《旅宿》那么豪放空灵，也不尽是《明暗》那么简练凝重，更有别于《心》和《从此以后》那么柔润细腻。在这里，刚柔兼用，雅俗并举，变化多端，声色俱艳。而且，将江户文学的幽默与风趣、汉学的典实与铿锵，西方文学的酣畅与机智熔为一炉，以致在语言的海洋中任情游弋，出神入化。笔墨忽而精炼隽永，针针见血，富于哲理；忽而九曲十迴，浩浩大波，长于思辨。暂且摘引两句景色和人物描写的妙句。例如挖苦苦沙弥平庸的脸说：“假如春风总是吹拂这么一张平滑的脸，料想那春风也太清闲

了吧！”写景：“给红松林装点过二三朱红的枫叶已经凋零，宛如逝去的梦。”“这声音毫不留情地震撼着初春恬静的空气，把个风软树静的太平盛世彻底庸俗化了。”有的像讽刺诗，有的像写意画，各得其妙。总之，假如以一颗艺术的心灵去触摸或感受他的作品，自然会体味到语言的色彩、声韵，甚至字字都是个生命体。

我国目前也正处观念转换时期，说不定猫公的观察，对我们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。不过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只得任人评说了。

窗外正大雪纷飞。东北雪总是那么魁伟、憨厚，却又沉甸甸、醉醺醺的。但愿这些披盔带甲的天兵天将，把猫公所诅咒的人间不平统统打杀。笔者将陪同读者，乘上瑞雪的幻舟，遨游一个梦里的清纯世界，何其快哉。

那么，让猫愁猫怨见鬼去吧！

于雷

一九九二年十一月

序 言

一九〇四年夏天梅雨初晴的一天，一只生下不久的小猫迷路走进夏目漱石的家。翌年一月发表的《我是猫》就是以这只小猫为模特的。漱石大概也没料到这竟成了他的处女作。

一九〇五年，漱石三十八岁。作为初出道的作家来说，可以说是大器晚成。在这之前，他只零碎写过俳句，也没有形成风格。漱石四十九岁病逝，生命不长，创作经历更短，前后不过十年。漱石又是一个很有特性、怪癖的人，创作一直处于紧张状态。

一般说，作家写一篇长篇小说之前，要有构思的过程，有的甚至还有篇小说提纲，不能什么准备也没有。说来奇特，《我是猫》成为长篇小说，却是另一种情况。

漱石是正冈子规“写生文”的崇拜者。子规死后，《杜鹃》杂志由高滨虚子主持。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在《杜鹃》同人组织的“山会”上，他朗读了《我是猫》，颇得好评。《杜鹃》杂志载于新年号，立即引起广泛反响。“在下是猫。还没名没姓。”以演说姿态开始的这句话，后来成为文坛的名句。“我”的原文为“吾辈”，后来成为小说的题名。“吾辈”、“余辈”、“我辈”在初次发表的正文中是混用的，强调用猫的眼睛观察人类和人类社会，带有嘲讽的意味。因为它生来不久就被书生扔掉，冻饿不堪，命运是不幸的。后为长着两撇胡须的教师苦沙弥收养，所见知识分子也都值得冷嘲热讽。《猫》本来只想发表一期即告结束，但它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夏目漱石。他进一步让猫观察下去，二月号《杜鹃》发表了续篇，四月号发表第三篇，一九〇六年八月号完成最后一章节第十一篇。小说在发表过程中就出版了单行本上编，完成时出版了中编和下编。小说的十一篇是在第一篇完成后逐渐构思的，没有严格的情节演进过程，既像抒情的“写生文”，又像结构松散的小说。作者后来说，它“没有题旨，没有结构，像无头无尾的海参似的。”

这是一篇在特殊条件下创作的特殊结构的小说。

极度郁愤是小说形成的条件，也是作家创作的动力。

一九〇三年由英国回到东京后的几年，是漱石一生中精神最紧张、最郁闷的一段时间。

回国后，作家和妻子镜子的关系更恶化了。漱石在夫妻关系上思想陈旧，要求妻子以他为绝对权威。而她的妻子精神却又不正常。结婚第二年镜子曾想投河自杀，漱石作俳句：“病妻室内灯昏暗/苦熬晚暮度秋天。”可以想见，一八八九年的秋季，镜子的精神病已经很严重。漱石留英期间，曾给镜子写信，倾诉自己很孤独，责怪妻子不写信。不久他患了严重神经衰弱症，一时传说他疯了。文部省曾有“夏目漱石精神失常”、护送回国的电文。回国后，漱石常为神经衰弱而苦恼，常常做出越轨的行动。夫妻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。他无缘无故打几岁的小孩子，一件小事也大发脾气。一次四岁长女将一枚硬币放在火盆边，漱石头脑里显现出他在伦敦时一枚硬币引起的不快，动手打了女儿。妻子怀疑他有精神病，请医生做过诊断。漱石的急躁、愤怒和越轨，反映了他对镜子的期望破灭。

回国后，漱石在东京帝国大学任讲师，工作亦不顺利。“英国文学概说”前任教授小泉八云深受学生的欢迎，漱石接课后不为学生所容，后讲“文学论”，同样不受欢迎。他情绪低落，经常闷在讲师工作室里，绝少出门。碰上好天气，才在工作室近处的不忍池边度过。他一度想要辞职，所挣的工资也难以支撑沉重的家庭负担。

阴郁、愤懑、神经质等，必然对其处女作产生深刻的影响。漱石后来说：“我对这种神经衰弱和疯狂深表感谢之意。”可见，神经最紧张的日子也是作家走向创作繁荣的时刻。

这绝不意味着《猫》的创作失掉了理性。而是说，《猫》的创作实践确实和作家的精神系统的病狂联系在一起。特别值得注意的，就是作家用猫眼看人生与社会，其中充满离奇的想象。但它不是颠狂的疯人语，而在精神重压之下的愤懑的倾述，那境界远远高于世上哲理大家。

为了说明这一问题，我们不妨看看漱石的生活与思想经历。作家生于一八六七年，第二年便发生了明治维新，封建幕府垮台，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起来。父亲是江户（今东京）奉行所直辖的名主，世

道虽然变了,但仍拥有权势和财产。母亲是商家的女儿,作为后妻已生育四男一女。漱石初名金之助,不知为什么,父亲就是不喜欢,每晚放在另家夜店的篮子里,姐姐发现将他抱回家。九个月後送盐原昌之助为养子。盐原也是名主,明治维新废除这官位后,迁居到江户享乐商业区的浅草。九岁时因养父母离婚,漱石重归自家。十四岁他最恋慕的生母病死。少年学过汉学,后学英语。十七岁离家独立生活,考入大学预备门预科(今东京一高前身)。其间,生父与养父为漱石的户籍问题,争执不下,使他苦恼不堪。后来在小说《道草》中说:“不论从生父看,还是从养父看,他不是人,而是物品。”最终,生父付出赔偿,方告结束。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期间,与同级的正冈子规相识。一八九〇年进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英文科,并获文部省贷费生资格。一八九三年毕业后入大学院,却对英国文学产生怀疑,对禅宗发生浓厚兴趣。一八九六年与贵族院书记长女镜子结婚,其间曾先后任四国松山市松山中学、熊本第五高等学校教员。一九〇〇年留学英国。

漱石所经历的是明治维新后很多知识分子共同走过的路,但他有自己的曲折的生活历程,这就使他认识了很多知识分子没有认识到的事物。

一九一一年,夏目漱石在和歌山市发表以《现代日本的开化》为题的演说。认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“开化”,和欧洲是不同的。欧洲的开化是“内发的”,它经由几百年的积累,“如行云流水是自然发展的”。日本开化却是“外发的”,是“在与外国接触”过程中被迫转化的。文化也是在大受刺激下急剧转变的。因为外来文化消融存在问题,土壤和根底均不相同,从而“失去自己本位的能力”,就必然引起“国民的某种空虚感”,也会出现“不满与不安”,发生“神经衰弱”病症。为了不患“神经衰弱”,“只能向内发的方向发展”,这是“苦恼的真实”。

从上述演说不难看出,漱石对明治维新改革的不彻底性是有清醒的认识的。他在一九〇六年写作的《片断》中也说:“当知道开化的无价值,就是厌世观的开始。”进一步发展,就会成为“真正的厌世文学”。

这里特别引人注意的,是“厌世”的观点。“厌世”、“苦恼”、“郁

愤”是漱石常用的词汇，也是他的世界观和创作观。如他说：“不描写烦恼称不上是文学”，还说：“在现在不得神经衰弱的人，大多数是有钱的鲁钝之徒和没有教养的无良心之徒”。一九〇六年他在致高滨虚子的信里说，他创作《猫》等，即是在“倾诉”自己的郁闷和忿懣。

漱石在留学英国时写作的《片断》里还说：“有钱的人多数干的是无学无知的鄙劣之事”，“其结果是使没有教养、不足年龄、没有德义的人进入士大夫社会。”作家对资产阶级是厌恶的。在一九〇五年前后，即写作《我是猫》的那个时刻，作家在《片断》中写道：“汝所见者为利害之世。我所立者为理否之世。汝所见者为现象之世。我所视者为实相之世。人爵——天爵。荣枯——正邪。得失——善恶。”

一九〇二年当日本人为日英同盟缔结，日本跻身列强而欢呼时，漱石却以冷淡的面孔对待。他在致中根重一信中说：“今天欧洲文明失败的原因，就是极为悬殊的贫富差别。”这导致“革命的必然性”，“卡尔·马克思的所论”是“理所当然的事”。

漱石清楚地看出资本主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，而日本的矛盾则尤使他生厌和悲观。《我是猫》所针对的正是明治维新后的“金权社会”的矛盾及维新的不彻底性，即“利害”、“正邪”、“善恶”、“不安”、“空虚”等。作家是明治精神文明的最深刻的揭发者与批判者，他使用的手法是“猫”的嘲讽和评断。其辛辣和深刻性，迅即引起世人的感叹和兴味。

漱石和绝大多数资产阶级作家一样，看不到摆脱这一矛盾的出路，无法指明克服维新不彻底性的办法。他只能是郁闷与愤懣而已。他也力图寻找摆脱矛盾的方法，那就是推进“内发的”变化。不过，漱石所说的日本的“内发”，与欧洲也不同。他认为欧洲的文明也是失败的，日本自然不应该再走这条路。日本的另一条路，就是他后来提出的“则天去私”。这是一种东方的宗教观与社会观。在《猫》中，铃木藤十郎的“狂”、甘木医生的“死”和八木独仙的“信”都演绎着“则天去私”的观点。漱石虽然也嘲讽独仙的东方的“自然法”的修养，而最终他也只能在精神信仰上寻求解脱。

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，都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。漱石信

仰的也是个人主义。“则天去私”的宗教解脱是和个人主义相结合的。一九一四年，漱石在学习院辅仁会发表题为《我的个人主义》的讲演时说，“权力的威压”、“金钱的诱惑”会导致危险的后果，与人的个性也是矛盾的。一个人首先要“发展个性”、“尊重个性”，“我毫无忌惮地公开说，我是个人主义”。作家认为个人主义以“自己本位”立足，和“国家主义”不是背反的，只是国家间的道义不如个人道义。他主张“以个人幸福为基础的个人主义，其内容当然是个人的自由。但是，各个人享有的自由是顺从国家安危的，就像寒暑表的升降一样。”在这里不难看出漱石资产阶级国家观的局限性。

上述对夏目漱石在二十世纪初年精神危机状态的了解和对其社会观、世界观的认识，是打开《我是猫》的门户的钥匙。有了这把钥匙，漱石的全部作品都可以打开。

《猫》的译者于雷，是我熟悉的作家、诗人、编审，也是日本文学翻译家。我们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共同度过了那些值得怀念的战斗时日。现在他要我为《猫》写序，我高兴地答应了他。是为序。

吕元明

译者前言

首先,就书名的译法交代几句。

一九八五年我一动手翻译这部作品,就为小说开头第一句、也便是书名的译法陷于深深的困惑。历来,这本书都是被译为《我是猫》的,然而,我不大赞同。因为,一、原书名不单纯是一个普通的判断句,就是说,它的题旨不在于求证“我是猫”,而是面对它眼里的愚蠢人类夸耀:“咱是猫,不是人”;二、尽管自诩为上知天文、下谙地理的圣猫、灵猫、神猫,本应大名鼎鼎,却还没有个名字,这矛盾的讽刺、幽默的声色,扩散为全书的风格。

问题在于原文的“吾輩”这个词怎么译才好。它是以“我”为核心,但又不同于日文的“私”(わたくし)。原来“吾輩”这个词,源于日本古代老臣在新帝面前的谦称。不亢不卑,却谦中有傲,类似我国古代宦官口里的“咱家”。明治前后,“吾輩”这个词流于市井,类似我国评书中的“在下”,孙悟空口里的“俺老孙”,还有自鸣得意的“咱”,以及“老敞”等等。“敞”,本是谦称,加个“老”字,就不是等闲之辈了。

我曾写信请教过一些日本朋友与国内作家、翻译家、编辑,有的同意用“在下”,有的同意用“咱家”,还有的劝我不要费脑筋耍什么花样,就译成“我是猫”蛮好。于是,我的译文改来改去,忽而“在下”,忽而“咱家”,忽而“小可”,总是举棋未定。直到刘德友先生和冷铁铮先生发表了学术性很强的论文,才胆子壮了,确定用“咱家”。当然,这是根据猫公心态和文章风格而定,并不是说“吾輩”只能译成“咱家”。近读日本一位已故公使留下的一篇与中国要人接触的回忆录中,也曾以谦虚的口气用过“吾輩”一词,我想,这就不宜译成“咱家”,倒近乎“不才”、“小可”……

至于书名,因为至今日本文学史、甚至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